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华西旅行考察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英] 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著 ◎ 著

黄田 ◎ 译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华西旅行考察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英] 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著 ◎ 著

黄田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西旅行考察记(英)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著;黄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229-12996-5

I. ①华… II. ①爱… ②黄… III. ①西南地区—地方史 IV. ①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750号

华西旅行考察记

华西旅行考察记

HUAXI LÜXING KAOCHAJI

[英]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 著 黄田 译

责任编辑:徐 飞

责任校对:李小璐

装帧设计:彭平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06千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996-5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任：周 勇 程武彦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川平 艾智科 刘兴亮 刘德奉 张 波

张荣祥 李 波 李廷勇 何智亚 邹后曦

黄晓东 常云平 曾 超 蓝 勇 戴 伶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周 勇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庆也不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方列强以利炮坚船侵入中国，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重庆之于沿海，晚半个世纪。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南京条约》，西方列强强开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出海口岸；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西方强开天津、南京、汉口等 11 个通商口岸，其势力伸入长江流域中下游；随即剑指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云南。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工商界不断催促其政府沿长江西进，把上溯重庆，强迫重庆开埠，进而夺取长江上游，作为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首要目标。从 60—70 年代，英国外交官员、冒险家、企业家、海军小组等纷纷进入四川重庆，考察调研。1874 年夏，英、法洋行更雇用民船私载洋货上驶重庆，直接闯关。1876 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英国取得“派员驻寓”重庆和宜昌开埠等特权；同时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轮船上驶重庆，其最终迫使重庆开埠的计划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随后，历任英国驻重庆领事一面加紧调研，一面游说鼓动。此举直接催生了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建造轮船驶抵宜昌，迫使中国政府与英国再谈重庆开埠条件。1890 年 3 月 31 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

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

重庆开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列强在中国长江上游取得的最西端的通商口岸，英国的得手意味着欧美列强在这一领域对中国特权的“一体均沾”。1896年，后起的东亚列强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对日开埠。重庆成为列强共同侵占的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开埠，也开启了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活跃着一大批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以英国为最。从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就掀起了一股“游历”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准许“洋人”进入中国内陆，更成为英、法、日、德等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大量英国人渡海远行，溯江而上，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有的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服务于国家对外扩张战略；有的探险、游历，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西部的社会信息。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回国后到处演讲，并以日记、游记或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扩大影响，也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我从1979年起，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期间，读到不少洋人有关重庆的著作。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海卫副司法行政长官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又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对川江航道、重庆煤矿、养蚕业、水利灌溉以及白蜡产业的考察；有英国记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又译为：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对川江航道、入川陆路、四川人口、铁路、工商业以及新式教育等的综合考察；英国作家、探险家以及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院士毕晓普女士（J.F.Bishop, F.R.G.S.），她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历时15个月的实地考察，尤其对长江上游和重庆的山川风貌、人情风土、社会环境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进而提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贸首都、清帝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尤其是有促成重

庆开埠并第一个带领轮船驶抵重庆的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Archibald John Little)，他留下了名篇《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曾译为《长江三峡游记》或《扁舟过三峡》)，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作品。有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留下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记载了他在中国各地游历的见闻，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四川重庆的“栈云”和“峡雨”。有英国派驻重庆领事官谢立山从重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深入考察，留下的《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一时轰动，重庆乃至西南逐渐被西方人所熟知。有天主教川东教区法国传教士华芳济 (P.Francois Fleury) 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详细记录了余栋臣起义过程中他被俘的经历。有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 (émile Auguste Léon Hourst，又译为：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 留下的《长江激流行——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艇首航长江上游》。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由法国人撰写的有关川江航行和重庆城市历史的著作。有天主教重庆教区大修院院长古洛东 (Gourdon) 撰写的《圣教入川记》，记述了明朝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和在四川的活动。还有英国的冒险旅行家托马斯·索恩维尔·库柏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 撰写的《蓄辮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他是西方最早一批敢于直面风险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家之一，也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商路的第一人，等等。

这其中，有三类史料的量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围绕重庆开埠谈判的档案史料。重庆开埠共进行了三场谈判，一是 1875—1876 年，中英烟台谈判，最终以签订《烟台条约》而告终，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二是 1887 年开始的中英宜昌谈判。这场谈判的主题就是重庆开埠，谈了近 4 年，到 1890 年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三是 1895 年，中日马关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对日本开埠。1980 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这段历史时，所能依据的只有收录在《清季外交史料》之中的中国档案史料。近 40 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重庆开埠的史料大大地扩展了。首先是日本档案史料的公布。2001 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建成开放，公布了近代

以来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的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有关机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里面不但有中日马关谈判关于重庆的史料，更有日本人打探到的中英两国在烟台、宜昌谈判中的重要情报。后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其次是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关中英谈判重庆开埠史料的解密。我曾两次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极丰。那里保存着 19 世纪以来英国与中国交往的丰富档案，特别是 1875—1876 年中英烟台谈判、1887—1890 年中英宜昌谈判中关于重庆开埠的原始文件，包括两国之间的历次照会、双方谈判代表给各自国家的报告、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信、签署条约的往来磋商函件，特别是《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正式文本，其详细、生动，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其中还包括中日马关谈判的记录抄件。日、英档案的披露，让我们完全回到了 100 多年前中英、中日关于重庆开埠谈判的历史现场，似乎还能感触到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无疑为我们在中国档案之外打开了一扇观察重庆近代历史的窗户，在近代历史大潮中的重庆开埠的历史就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是重庆海关档案的使用。1980 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时，得到我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海关史学家汤象龙先生的指导。他曾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往英法德学习研究经济史，搜集到 1891 年重庆开埠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先生无私地将其借我使用，我也从此开始运用旧中国海关档案来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随后，我又有机会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仁共同翻译整理了一批重庆海关报告。这是当时海关关员搜集到的各类情报，每月、每季、每年向总税务司和英驻渝领事呈报。以后形成惯例，每十年编制一份综合性报告。凡重庆地区鸦片、贸易、人口、科举、教育、地势、出产、民船、本国钱号钱庄、信局、都会、会馆、航业、税收、金融、财政、河道、邮局、电报、行政、谘议局、司法、警察、监狱、农业、矿山、制造业、市政、医院、物价、工资、陆海军、铁路、省议会、灾荒等，均在其中。即使四川省以及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陕西的有关内容也有不少。这些情报搜罗范围之广泛、内容之详尽、地域之宽广，令人惊叹，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些史料是中国的档案文献所不可替代的，极为宝贵。

再次是《华西教会新闻》的影印出版。《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也是近代四川办报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它于1899年2月创刊于重庆，1943年底停刊于成都，跨度长达45年。该刊旨在加强华西各教会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因此大量记载了当时教会，特别是华西的教会活动状况，同时也从教会的视角记录了那一时期重庆、四川的历史细节，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凡45卷。

这些宝贵的史料对我的历史研究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深知其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很早就有一个愿望，将这些珍贵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翻译出来，公开出版，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一笔基础性的历史记录，也让更多的学者可以使用，这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发掘弘扬都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市委老领导孟广涵和家父创办了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团结学界，扎扎实实地做重庆历史研究的基础建设。我们几个青年的提议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我和搭档刘景修整理翻译了一部分重庆海关档案，以《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为题，于1987年在母校四川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我也发动我的姐姐、爱人和朋友们来翻译这批资料。但是当时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求出版社“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出版。这是凭一己、一会之力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翻译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甚为遗憾。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随着所带学生的增加和成长，我越发有了紧迫感。

2010年，重庆市政府设立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市场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出版了一批好书。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规划“十三五”期间出版项目时，我提出了将我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撰写的

有关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重庆，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为重庆市“十三五”期间的出版规划项目。尽管这离我知道并接触这批史料快40年了，但40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就是这个项目的出版物。它是近代重庆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今天用全球化视野研究重庆的独特史料。它告诉我们，重庆史就是中国史、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和重庆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值得倍加珍惜。

近40年前，我开始研究重庆史的时候，早已有西方人记录和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中译本出版，而重庆则一本没有。我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今天，《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出版表明，我们不但有了，而且是一批。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我是感到欣慰的。

回望来路，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进入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些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是重庆学界改革开放40年的一项成果，也是我们向这个伟大节日的一份献礼。

集40年之经验，“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已经成为我们的理念。城市史研究只有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向第二个40年，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学术的支撑。

当此《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出版之际，我们以此告慰那些在我们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提携、扶持、关心、爱护过我们的老前辈。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建设城市文化，造福人民群众，嘉惠学人后人。

2018年7月1日

译者序

19世纪下半叶，以德国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为首的一批欧洲旅行者开始在中国各地深入考察，对于沿途的地理、气候、经济、民生、交通、语言乃至风俗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且丰富的记录。来自英国的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汉名贝德禄）是这批旅行者中的佼佼者之一，而他的《华西旅行考察记》亦是一本典型的考察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巴伯之前，除了西方的传教士，只有零星的欧洲探险家真正踏入过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而将自己在长江上游的见闻写出详细报告的，在当时也就只有巴伯与其挚友威廉·吉尔（William Gill，《金沙江》的作者）。

巴伯于1843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862年获奖学金入读剑桥大学，1866年在英国外交部的考试中拔得头筹，作为一名翻译实习生来到了中国。博闻强记的他很快便得到了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的赏识，在外交部步步高升：1879年出任英国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1885年出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之后又出任英国驻缅甸政治专员。1890年，巴伯在缅甸任上因病去世，时年47岁。

从《华西旅行考察记》中不难看出，巴伯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探险家。除了钻研汉语之外，他来到中国后还学习了大量的地理和天文知识，以便在旅途中搜集气象和地理信息。他在《川西考察记录》最后一节的开篇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们展示，含有大片未知之地的川西地区具有极高的探索价值。”《川西考察记录》于1881年完稿，由吉尔代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两年后，巴伯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最高荣誉，贡献人金质奖章（Patron's Medal）。

《华西旅行考察记》一书根据台湾成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翻译而成，共包括《川西考察记录》《打箭炉之旅》《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路线记录》与《川藏茶叶贸易记录》，其中以《川西考察记录》最为详细。全书采用通俗语言并提供了大量实例，为读者了解当时川、滇民生状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书中也侧面描写了19世纪的一些历史事件，譬如太平天国、杜文秀起义等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

这本书记叙的是作者眼中的中国，但我们无疑也能够通过其文字得以一窥作者本人的思想。巴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解读带着明显的国家立场和个人色彩。和许多19世纪来华的欧洲旅行者一样，他一方面高度赞赏中国的壮丽河山和辉煌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又对其穷困落后的现状表示极度的不屑。由于在华时间毕竟有限，他对于许多事物的理解也流于表面，甚至完全错误。尽管如此，该书仍然对于清史研究——以及重庆、四川和云南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另类视角，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我相信今日的读者（不论是拿着这本崭新译作的中国读者，还是在图书馆里翻出了英文原作的国外读者）能够充分意识到这本书的时代局限，以审辩式思维来分析书中的内容。

在翻译《华西旅行考察记》的过程中，我频频想起《离骚》中的那句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又得以在大学校园里长大；虽然也读过不少关于旧社会的文学作品，但对于当时年纪尚幼的我来说，不管是骆驼祥子还是三吏三别中的老妇，他们始终让我感觉有些遥远。我没有想到的是，在20多年后，一个19世纪英国人的考察记录会为我打开又一扇窗户。通过巴伯的文字，我见到了见多识广的和尚、吃苦耐劳的背夫、贪婪腐败的清廷官员、心思活络的商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命如草芥、多灾多难的中国农民。作者的文风鲜少煽情，但读者从各处细节都能体会到当时农民的贫困、蒙昧与麻木。《川西考察记录》的第二章一开头，作者坐船离开丰饶的成都平原，随行的苦力向他感叹成都的确是天府之国，然而几乎是同时，他看到了纤道上有两条狗在啃吃一具裸尸。到后来，随着他的考察路线越发地艰险，热闹的集市和美丽的建筑都消失不见，只剩下胼

手胼足的农民和土阶茅屋的村庄。哪怕如此，巴伯仍然说：“虽然乍看之下他们衣不蔽体、一贫如洗，但事实上，比起中国北方那些不时有饥荒之虞的几百万农民，他们的日子可能要好过得多。”

读到这里，怎能不掩卷叹息呢？

巴伯对于这些底层人民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平和的态度：他记录他们的穷困和无知，但并不因此讥笑他们；与此同时，他也不吝笔墨赞扬这些人身上的闪光点。不论是川人的热情好客，还是彝人的勇猛率直，在本书中都有生动体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伯在很多地方都犀利指出了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譬如在云南，他生动地描述了为什么当地矿业无法发展：由于当地官员肆无忌惮的贪污，没有人胆敢大规模投资矿井开采。在《川藏茶叶贸易记录》中，他则记下了藏人对于清廷官员的评价：“他们来的时候连裤子都不带，在走的时候，行李却要装满一千头牦牛。”

从作者成书的时代到如今的一百多年里，不论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经历了许多剧变。我相信，当读者通过此书回顾那一段历史，窥视其中的种种生动细节和人物——不论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还是石达开在大渡河的惨烈战役，一定会和我一样感慨万千。作为一名翻译者，也作为一个对着自己家乡抱着朴素的热爱之情的重庆人，我自始至终都致力于将此书的原貌呈现给读者。

不过，我在译稿中对原书中的两处地方酌情做出了删减。其一是作者记录的各地气压信息——这些信息在当时被视为非常有价值，但由于这一百多年中沧海桑田，许多历史地名已经很难严谨地对上现在的地名，对于当今的研究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其二，吉尔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上宣读完《川西考察记录》后，原稿获得了数名会员的高度赞扬，他们的发言在原书中亦有收录。考虑到这些溢美之词多流于表面，且并非出自巴伯本人笔下，我在本书中也未翻译。

除去这两点之外，为了能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感受那场 1881 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议，同时也是出于对于作者的尊重，我尽可能保留了作者对于事物的称呼。这其中包括一些已经过时或废除的称谓，譬如彝族的旧称“保保”等。

原书对中国地名、人名的拼写方法都和今日的国际标准不同，就连和后来的威妥玛拼音系统也不尽一致，要考证源出彝语和藏语的名称更是难上加难。同时，由于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巴伯（以及提供了大量批注的吉尔和尤里二人）引用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同时代欧洲旅行者的研究和中国的地方志等等。我为全书中出现的欧洲人物都加上了注释，也尽可能找出了汉语资料的原文。虽然我竭力做了许多考证工作，但译文中难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多方帮助：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黄晓东先生的整体指导让我受益良多，十字星翻译工作室的孙侃先生曾屡屡为我解惑地质学和建筑学方面的疑问，张倩女士则热情地提供了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信息。自然了，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因为有他们长久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我才能够放手做自己热爱的事。

我与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之间相隔了不止一个世纪。为了翻译这本书，我将他的四份报告读了个滚瓜烂熟，又用互联网查找了一切可以入手的传记资料，甚至还去伦敦拜访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总部。在这一路上，我时常惊叹他秉性坚韧，聪慧通达；但与此同时，就像他的英式幽默每每令我忍俊不禁，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各种误解也多次让我哭笑不得。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巴伯能像眼下流行的电视剧里面那样，“穿越”到今日的中国，今日的川渝，他会作何感想呢？他笔下的重庆周边小村庄修起了机场，在抗日战争期间，飞虎队的队员就从这里出发。而“周长约十二英里”，“总人口 35 万人左右”的成都，则已经和重庆并肩成为了国际化的巨型都市，同时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当高铁代替了轿子，当罂粟花终于从山谷里消失，当空调与冰箱驱逐了能热死人的酷暑……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承受了难以言述的伤痛，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终究是走过来了。在我们回首历史之后，更当向前看。

黄田

2018年8月8日

于纽约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一、川西考察记录^①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周勇 / 001

译者序 / 001

001

一、川西考察记录

(一) 前往省会 / 003

(二) 峨眉山 / 031

(三) 同河 / 049

(四) 西昌河谷 / 065

西番部落记录 / 098

附录 / 107

(五) 金沙江两岸 / 108

古老的石刻遗迹 / 137

151

二、1878 年前往打箭炉之旅

157

三、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从大理府至腾越

207

四、川藏茶叶贸易记录

① 本丛书为《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周勇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

